

董学荣

吴瑛

著

# 滇池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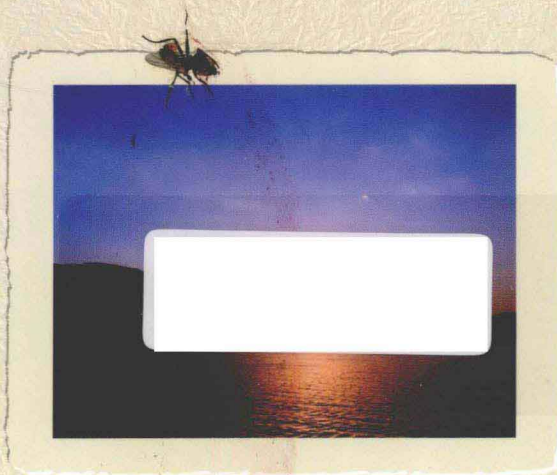
——千年环境史的视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生态人类学丛书

尹绍亭 何明◎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受以下项目及单位资助：

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省民族多样性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

云南省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传播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 滇池沧桑

——千年环境史的视野

董学荣 吴瑛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内容提要

千百年来,滇池环境变迁的根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是“人进水退”。优越的生存空间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滇池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和兵家必争之地。从“涸水谋田”到“围海造田”,从内地化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表现了人口集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与水争地、与林争地的博弈及人类的高歌猛进;与此同时,在自然演变及人类干预的双重影响下,滇池环境日益脆弱,水域不断萎缩,水体污染变质,自净能力及多种功能逐渐丧失,在加速“小化”、异化、毒化、老化中迅速“退化”。滇池水危机与“公地悲剧”,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旷日持久的滇池治理保护中,调动了不同方面、不同层面越来越多人、财、物的投入,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水环境空间结构日益趋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从敬畏自然、“人进水退”到“四退三还”,从“向滇池进军”到建设美丽昆明与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历经整体有机的统一与主客二分的严重对立,重新迈向和谐发展的新纪元。

责任编辑:石红华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池沧桑:千年环境史的视野/董学荣,吴瑛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30-2168-5

I. ①滇… II. ①董…②吴… III. ①滇池—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研究 IV. ①X32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070号

## 滇池沧桑——千年环境史的视野

DIANCHI CANGSANG——QIANNIAN HUANJINGSHI DE SHIYE

董学荣 吴瑛 著

---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印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本:787mm×1092mm 1/16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字数:308千字

ISBN 978-7-5130-2168-5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9.5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总 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急剧变迁的时代。

当代地球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恶化，众所周知，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缺失必需的伦理、法规和保障机制：缺失全民高度尊崇、严格自我约束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缺失公民和族群所具有的生态和资源权益不受侵犯的有效法规，缺失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必不可少的高度民主、公开、透明、科学的评估及决策机制，缺失健全、有效和权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二是人类狂妄愚昧劣性的膨胀：如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事，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坚持文化中心主义，否定文化多样性，不尊重地方性知识和不同民族的传统知识；经济、物质至上，为追求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片面追求发展，制造生态灾难；盛行高能、高耗、高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污染生态环境；迷信科学技术，盲目采用不安全的新技术和化学物质，酿成环境灾难等。

近三十年来，对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观及其盲目开发发展行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已成潮流，主要反映在三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二是文化多样性价值和意义的再认识，三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三个层次的反思、讨论和探索，刺激了学术的创新，促进了某些学科的发展。例如最近二十年来，重新审视历史和自然，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变迁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将古今生态环境演变的规律一并纳入视野的整合性的名之为“环境史”的研究，便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新的分野。与此相对应，作为横向的尚未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完全吞没的各地域、各民族的活生生的生态智慧、经验和知识，也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而在众多的学科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各民族、各地域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研究、宣传、抢救、发掘、传承和利用的学科，不是别的，就是生态人类学。

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迄至今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西部的研究远胜于东部的研究。原因不难明白，东部开发早，市场经济发达，现代化速度快，全球化影响大，传统文化包括生态文化急速变迁、大量消亡了；西部是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富集区域，开发较晚，市场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较弱，传统生态文化虽然也有不少变异、流失，然而尚有丰富的遗存和踪迹可寻。二是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国外早先的经典的生态人类学著作，研究对象多为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和族群，而当我们开始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国内的许多对象，虽然依然保持着传统，然而均已成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冲击、移民开发干扰、扶贫发展促进、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化蔓延等因素的不断的综合的影响之下，原有的比较单一的文化变成了复杂的复合文化。面对这样的事象，一方面得厘清、剥离外来文化成分，还原传统文化的面目，阐释其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以考察文化的变迁及其发展的趋势。国外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封闭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到复杂社会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两个阶段，而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复杂环境中复合文化，国外的两个研究阶段被融为了一体。三是具有较强的应用倾向。面对激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并与生存、公平、权益、发展、政治、安定、和谐等各种问题相互渗透和纠结，涉足其间，难免产生共鸣和关怀。因此，正视现实问题，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倡导建设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念，已成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者的自觉追求。

上述三个特点，在我们主编的这套生态人类学丛书中有很好的体现。首先，丛书的作者们都大都关注我国西部，研究对象集中于最富文化和生态特色、最具生态人类学研究内涵的两个地域：西南山地和北方草原。其次，丛书的研究依然承袭学术传统，一方面重在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阐释，尤其重在对于无文献记载而且长期不被正确认识的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则着力探索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传承、活用传统知识并

重建有效适应当代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第三，丛书的部分选题超越了传统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敏锐地将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和热点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例如大坝、灾害、绿洲、水污染等研究即属此类，具有较高的学术及应用价值。

近年来，人类学的丛书不少，而作为生态人类学的丛书，这还是较成规模的第一套。无论从作者的层次和准备来看，还是从作品的选题和水平来看，本丛书均属难得，值得期待。至于缺憾，在所难免，祈望学界批评。在今后的学术跋涉中，作者们自当不急不躁，笃实前行，为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再书华章。

**编者 2012 年深春于昆明**

# 绪 论

---

滇池污染及其治理保护之所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话题，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除了问题本身的严重性、重要性，是否还与当今时代人类关于持续性生存的深切忧虑密切相关？

无论如何，滇池污染及其治理保护，已成为滇池环境变迁中的一个焦点。时间定格在 20 世纪中后期，21 世纪前期。即使用一个世纪的时间让“高原明珠”重放异彩，在滇池 340 万年的历史，也可以视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闪光点。

千百年来滇池沧桑的根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是“人进水退”。“人进”，集中表现在人口的增长集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水退”，集中表现在滇池水域的萎缩、水体的污染及功能的退化。从“人进水退”到“四退三还”，是滇池环境史上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从“涸水谋田”到“围海造田”，从内地化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从苴兰城、拓东城到现代新昆明，滇池之滨已形成拥有 300 多万人口的现代化超大城市，并向区域性国际城市迈进。与此同时，滇池水域不断“萎缩”，水体污染变质，功能衰减，滇池在“小化”、“富营养化”、“异化”、“毒化”、“退化”中“老化”。滇池形成于 340 万年前。<sup>①</sup> 30 万年前，留下了厚达数十米的中更新统中营组沉积，内含介形虫、腹足类化石。3 万年前，滇池周边已

---

① 根据<sup>14</sup>C测定和古地磁资料分析，滇池形成距今已有 340 万年。



有人类生息繁衍。<sup>①</sup> 3000 年前，滇池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sup>②</sup> 300 年前，已看不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但远比现在广阔，碧水蓝天，是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天堂”。30 年前，滇池已变成Ⅳ类水，与“高原明珠”渐行渐远。

滇池环境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乃至举世瞩目。这或者不只是因为滇池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滇池不仅仅是昆明的滇池，而且也是云南的滇池，中国的滇池，人类的滇池。

——人类行为与滇池命运，蕴涵着人与自然的悲欢离合。环境史讲述的，不只是“人类的故事”，也不是纯粹“自然的故事”，恰恰是“人与自然的故事”。

环境问题往往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环境史为理解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变迁的进程深深植根于过去，环境史家提醒人们，不要让现今存在的问题遮挡了人们关注历史的视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偏见和短视。

在辩证唯物论的视野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联系是普遍的，发展是永恒的……滇池环境作为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运动变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地质学家指出，早在滇池形成之前的数十亿年间，滇池地区经历了无数次的海陆交替演变，几经沧海桑田。约在 340 万年前，历经老构造运动、新构造运动，断裂构造夷平沉积成湖；340 万年来，滇池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运动变化，滇池湖底沉积地层及周边出露岩石都有迹象表明。距今 3 万年，滇池流域有了人类生息繁衍的踪迹——呈贡龙潭山昆明人。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从有了人类，人类行为就成为影响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也有专家研究指出，前工业社会对环境的破坏也毫不逊色。纵火、打猎、放牧、农耕、滥伐森林等，都可能造成环境破坏与生态灾难，乃至文明的毁灭。某种文明对其环境的适应，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在变，文化只有不停地适应，形成某种机制。滇池治理保护各级各类机构的设置、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人员队伍的配

① 呈贡龙潭山昆明人生存年代约在  $3\text{万} \pm 800$  年。

② 滇池流域何时进入青铜时代，有几种大同小异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公元前 12 世纪以前，滇池地区在石寨山文化之前就已经跨入了铜器时代的门槛”。参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239。

置与建设等，即体制的建立及机制的完善，就是对当前滇池环境变迁的有效适应。由此可见，环境与人类是相互影响与互动的。而这种互动变迁的演进过程，正是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环境史的“本体”。“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对话，它关注的焦点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游离于自然之外。”<sup>①</sup> 穿越滇池环境变迁的“时间隧道”，探索人与滇池的交往联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滇池环境史的理想追求。当然，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的，理想的实现也总是十分艰苦的。

那么，滇池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类的，人类又是如何影响滇池环境的？滇池环境问题，是自然演变的必然，还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 —

有人说，滇池是“高原明珠”。

——其美丽与价值，不言而喻。

有人说，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

——昆明与滇池的关系，滇池对昆明的意义，如此简单明了。

有人说，“尽泻滇池之水，可得田三百万顷”；有人说，“滇池清，昆明兴”，滇池治理保护，“不仅是最大的环境工程，而且也是最大的民心工程”。从“涸水谋田”、“围海造田”到“铁腕治污”、“退田还湖”，是人类与滇池交往互动史上的划时代转换。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作为，不同的滇池。

优越的生存空间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滇池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和兵家必争之地。

有人说，历史时期滇池的演变，主要是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有人说，是因为经历了 340 万年的演化，滇池已经进入了“老年”阶段。

---

① [英] 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M]. 包茂红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1.



滇池治理保护 40 年，费尽移山心力，污染加剧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于是，有人说：滇池污染容易，治理难！

——滇池的问题，究竟是自然演化的必然，还是人类干预的结果？滇池之难治，是非人力所能及，还是观念有问题？

滇池治理保护研究，确实需要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多视野、多学科的努力。环境史的主题，是追溯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滇池环境史，尤其关注滇池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滇池的“改造”与后果及其引起的人类适应机制的演进，以及人类关于自然之思所致的对待滇池的态度、行为及后果。

人类与滇池，曾经有过比较和谐的时期。那是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在滇池边采集、狩猎，在滇池里捕鱼、捞螺蛳，有时候似乎还在碧水蓝天的滇池里举行划船比赛，创造了神奇的“贝丘文化”和辉煌的青铜文化。当时，与“强大的”自然相比，人类还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对自然充满了好奇、惊恐和敬畏。因而，人们与滇池保持着良好的依存关系。

但是，千百年来滇池沧桑的根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是“人进水退”。

古滇池很大，“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大致是元朝前后的事。研究表明，远古时期的滇池，水域曾经达到 1260 平方千米，水深超过百米，蓄水超过 800 亿立方米。近 700 年来，滇池水域缩小 200 多平方千米，其中，1938~1978 年的 40 年间就缩小了 38.8 平方千米，平均几乎每年缩减 1 平方千米。今日之滇池，水域不及古滇池的 1/4，水深不及 1/20，蓄水不及 1/50。今日之昆明，全在古滇池之底。滇池哺育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化，滋养了历史文化名城昆明，调节出“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具有调蓄、航运、旅游、发电、灌溉、养殖、工业用水等多种功能，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滇池水体依然清澈见底，是水生动植物的“乐园”和优质的饮用水水源，由于 70 年代以来水体污染日益严重，滇池的多种功能及自净能力逐渐丧失。

滇池与昆明，并非从来如此。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滇池地区几经沉浮，沧海桑田。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滇池经历了刺桐关出流时代和海口河出流时代。海口河袭夺出流是滇池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原因有二：其一，滇池因此从红河流域皈依长江流域；其二，滇池水位大幅度下降，露出沃野千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空间及肥沃的土壤。



但在唐代以前，人类在滇池流域的生息繁衍和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滇池东南及西北两个区域，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国筑拓东城，是滇池流域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开发重心从此转移到了滇池北岸。由拓东城经鄯阐府城、鸭池城、中庆路城、云南府城到昆明，一脉相承发展到现代新昆明。历史时期滇池的巨大变迁始于元朝，700年来水域缩小了200多平方千米，如果说这一时期滇池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大变小，那么，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则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滇池继续变小；另一方面，滇池水体污染加剧。“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摸虾做菜，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风光不在，现今时代依然受害。”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滇池水质变迁和人们的无奈。20世纪70年代以前，滇池草海和外海水质都好于Ⅱ类，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昆明时还把滇池誉为“高原明珠”，70年代后期变成Ⅲ类，80年代变成Ⅳ类，90年代变成Ⅴ类和劣Ⅴ类。滇池加速“老化”、“小化”的同时，还被“异化”和“毒化”。资源型缺水 and 水质型缺水，导致了严重的水危机，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专家指出，历史时期影响滇池环境变迁的主要力量是人为因素。但有迹象表明，在有人类活动以前，滇池就一直处在变动之中。直到今天，滇池变浅是否与地质抬升运动密不可分，抑或完全是人类污染、水土流失的沉积所致，尚需研究。海口出水口河闸一经修成，在不降低河闸的情况下，实际上滇池水位基本上不会有较大改变。所以，滇池环境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时间与空间流转中、人与自然互动中进行考察。

滇池治理已有漫长的历史，现代意义的滇池治理保护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一，滇池治理保护，牵动千家万户，调动了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巨大投入。从地方到中央、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从世界银行到日元贷款、从技术治理到人文参与、从水体净化到综合治理、从“人进水退”到“四退三还”、从“人定胜天”到道法自然、从唯GDP是从到生态文明出场，历时40载，耗资数百亿，涌现出“感动中国”的“滇池卫士”，认识到了滇池治理保护的艰巨性、复杂性。



## 二

什么是环境史？美国环境史学家 J. 唐纳德·休斯指出：“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sup>①</sup> 环境史的主题有三：一是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二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响应；三是人们的环境思想和态度是如何影响环境变迁的。

研究滇池环境史，就是要追问滇池流域环境的变迁及其缘由，人类行为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揭示造成滇池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通过追溯人与环境互动的过去，阐释人与环境对立的现在，为建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明天提供参考。作为特定区域史学重构的创新探索，滇池环境史试图体现如下内涵和理念。

第一，滇池环境史讲述的是“天人共演”的故事。滇池环境史讲述的不仅仅是“自然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人类的故事”，而是人与自然互动演进的“故事”，说到底，就是自然走进历史，人类回归自然。滇池环境史努力将人类事件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探讨每一时代人类事件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追寻自然现象背后隐含的人类活动的踪影。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乃至整个自然都是历史的演员，而不是背景。人类不是一厢情愿的自导自演，而是人与自然共舞。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到自然，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但从人类社会到自然转向，是一种质的飞跃，是历史研究从思维、逻辑、理念、视野、对象、叙述模式、诠释的立场到文本框架的根本性重构。自然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言说”的主体，和人类拥有同等的“话语权”。正如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语言转向是“以退为进”的向前发展，历史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到自然转

① [美] J. 唐纳德·休斯. 什么是环境史 [M]. 梅雪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向是“从上到下”的拓展自己的“领地”而向前发展的。滇池环境史的叙述对象，是在时间流变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演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交换关系：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发生相互的作用。

第二，作为历史的特殊样式，滇池环境史同样具有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双重含义。作为历史本体，是指滇池流域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过程；作为历史认识，是指人们对该过程的反思和认识。在历史本体的意义上，该过程既不可以重演，也不可能还原，而只能依据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摆脱“当代”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深深烙印。因而，滇池环境史也不可能超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滇池环境史也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检讨。人类需要检讨和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人类一味向自然索取，我们还给自然的究竟是什么？

第三，滇池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对滇池环境问题的形成进行追问和反思，通过回顾人与自然一路走来的曲折历程，阐释当下的实然与深刻根由，前瞻应然的图景与路径选择。在此追问与反思的过程中，尝试找到人类自己的“位置”，更新历史的观念，证悟超然的“大我”。要通过讲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变化的故事，揭示我们是如何到达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为什么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这个样子。促使今天的人们更好地关心被叙述的对象——环境（大气、水、土地等）以及环境中的人，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存家园的呵护，同时审视自己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道德水平。

第四，作为一种创新尝试和探索，滇池环境史试图体现“道”与“器”的合一。“形而上者”的道，至少包括环境史的理念和生态伦理的基本精神；“形而下者”的器，则是指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诸学科的研究方法。滇池环境史力图正确把握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努力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传统思维模式及“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藩篱，在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人类—环境互动论”的生态史观和研究范式。

第五，由于历史本体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和认识的有限性，滇池环境史只可能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一次探索尝试的呈现。人类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是在极其广阔的时空、领域和层面展开的。滇池环境史关注领域的扩大并



不意味着它可以包打天下，将所有相关问题一览无遗，恰恰相反，它只可能更多关注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及其影响。滇池环境史将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着重考察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历史变化，考察系统内部诸多因素之间，特别是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揭示系统演化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机制。人与自然之间早已结成并不断延续着那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这对关系而一再演绎的或悲壮或凄美的故事，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抑或本属天人共演的故事，都是环境史叙述的重点所在。

第六，运用环境史的理论方法研究滇池流域人与自然互动过程目前尚未看到相关成果，但是，对滇池流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的研究，是滇池环境史立足的“巨人的肩膀”。

### 三

基于上述考虑，滇池环境史没有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主要选择滇池与人类互动演进中的关键环节加以阐释。全书分为三篇十章，上篇为滇池水环境形成的历史意象；中篇为滇池水环境改造的认知轨迹；下篇为滇池水环境利用与保护的现代图景。各章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滇池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史前时期，滇池地区在构造运动中几经沧海桑田，在老构造运动中形成西山大断层，在新构造运动中最终形成高原断陷湖。至今，滇池仍然处于现代构造运动中，湖盆抬升，湖水变浅，蓄水减少，湖泊老化，很有可能与自然的演化密不可分。地质、地貌、土壤、气候、资源等，是构成滇池环境的重要因素。这些要素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滇池流域优越的生存条件，同时，滇池自然环境也具有严重的脆弱性。优越的生存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区位，使滇池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和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的移民开发和人口集聚，使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不断趋于紧张对立。内地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和超大城市的形成，最终使二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和激化。

第二章，气候变化与滇池湖泊环境响应。气候是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又对其他环境因素具有总体性的影响。历史时期滇池流域气候变化总体上与全国性气候变化相一致，但也有其区域性特点，这种变化在考古发掘、物候变迁和方志记载中都留下了显著痕迹。元代以来“小冰期”的影响十分显著，冷湿气候导致的洪涝灾害持续不断，元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逐步制度化、系统化、理论化。近百年来，滇池流域暖干化趋势日益明显，滇池环境也产生了显著响应。

第三章，人类活动与滇池流域文明之光。滇池流域优越的生存空间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至迟在3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滇池流域已发现20多处，石器、陶器、“贝丘文化”与稻谷的培育，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异彩纷呈的古滇青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堪称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无可争议地表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滇池流域已不再是蛮荒之地。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人们与滇池之间已有密切频繁的交往，但由于人口较少，生产力不发达，人与自然之间仍然保持着整体有机统一的和谐状态。

第四章，肇始：人口集聚与滇池流域水利开发。早在石器时代，滇池流域就与中原地区及其他文化有了交流，“庄蹻入滇”在带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加快了滇池流域的内地化进程。“汉习楼船”的结果是把“滇大国”变成了“滇小国”，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之一，是在滇池流域及其周边广大地区设置了益州郡，在滇池环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开辟了滇池流域农田水利建设的新篇章。南诏“拓东城”的兴建标志着滇池流域战略地位的提升和开发重心的北移。大理国时期金汁河和银汁河的治理，表明滇池流域人水矛盾开始凸现。

第五章，农耕经济与滇池流域水利建设。元明清是滇池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滇池流域第一次成为“省会”，由南诏、大理国的“东京”（副中心）上升为云南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滇池流域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必然导致开发的加强、人口的集聚、交往的频繁，从而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小冰期”的来临，长时段的持续阴冷潮湿，降雨增加，水患频发，以及“小冰期”结束



前气候剧烈变动,水旱灾害频繁交替演变,推动了滇池环境变迁和水利发展。这一时期滇池水利的发展,集中体现在水利工程系统化、水利管理制度化和水利建设经验理论化,蕴藏其后的动力则是中央集权的持续加强和边疆内地化的发展。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为中央王朝“治水”提供了机遇。通过“治水”,造福黎民百姓,树立起中央王朝的权威,对边疆的统治逐步加强和巩固。因而,环境的变迁或水利建设,成为边疆内地化和中央集权建立的重要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因素明显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共同主体”。

第六章,灾害:自然的言说与人力的证悟。元明清以来,滇池流域灾害不绝于史。这一章选取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灾害——在横切面上进行阐述。灾害,包括天灾、人祸。滇池环境史中,主要探讨的是天灾,即自然灾害。但实际上,所谓的自然灾害,许多并非纯粹自然的产物,往往带有人类影响的显著痕迹;还有很多灾害,则有可能主要是人为因素所致。灾害,是自然与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灾害是影响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灾害也是环境变迁的产物。灾害是环境史的重要主题。人类行为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制约,这种影响制约,在人类的童年尤其突出,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而“式微”。知识就是力量,技术使人虚妄,凭着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人类似乎可摆脱自然限制,向自然宣战。实际上,自然永远都不可能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舞台,自然不是“沉默的羔羊”,自然的“言说”无处不在,灾害是其“主张”权威的话语形式。

第七章,滇池环湖工业布局与水环境利用。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既是近代历史的重要标志,也揭开了滇池流域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篇章。昆明近代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期有了缓慢发展,抗战时期大批沿海和内地重要工业迁入昆明,奠定了昆明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是与传统农牧业和手工业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在滇池环境中增添了新的异质性因素,引起了人水关系的深刻变革。

第八章,“围海造田”与滇池环境变迁。“围海造田”是特定时空中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模式,是人类强烈干预自然环境的极端典型,不是个体行为所能及,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组织行为。20世纪中后期滇池“围海造田”的上演,

有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有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种种特殊原因，尤其是人口高速增长的直接推动，是人口增长的客观现实与人水争地传统推动下共同产生的结果。这一在特定时空中形成的人对自然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其结果却与人的初衷相去甚远。

第九章，滇池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环境代价。20 世纪 70 年代是滇池湖泊环境变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滇池由大变小、由深变浅，在此之后，除了继续变小、变浅，还突出表现在滇池富营养化，水体污染，水质变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结构突变等方面，在进一步“小化”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老化”、“退化”和“异化”。如果说前期还只是一种物理变化，后期则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变化急剧发生，交互作用，导致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发，严重制约人类生存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水危机深化的同时，人类也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发展困境。

第十章，滇池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环境保护。在环境污染凸现并开始加剧的 20 世纪 70 年代，滇池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保护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80 年代重点在工业污染源治理，确定了以水源保护区、滇池汇水区、居民稠密区、风景旅游区为重点的防治目标，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和削减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遏制了滇池水质迅速恶化的趋势。“九五”以来，国务院连续三个五年计划都将滇池纳入国家“三河三湖”重点污染治理项目。2000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滇池水污染治理摆在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滇池作为全省九大高原湖泊之首，每年召开专题会议对滇池污染治理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不断完善治理思路，不断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加大治理投入。采取一系列点源、面源、内源等治理措施，持续、有力地推进了滇池污染治理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滇池治理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导多次实地视察和调研，对滇池治理保护作出重要指示。1972 年，周恩来总理到昆明时把滇池誉为“高原明珠”，并亲切叮咛一定要把滇池保护好，否则将会影响昆明的整个发展。2009 年 7 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时作出重要指示：“要突出抓好滇池等水污染综合治理，下决心把滇池污染治理搞得更好些更快些，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云南发展的宝贵资源和最大优势。”总书记视